

“从中国出发”的全球史

唐骋华

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主编、汇集2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与撰写的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于日前出版，并引起广泛讨论。全书分三卷，摒弃一切“中心主义”，探讨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，讲述全球史中的帝国、战争与移民、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、宗教与信仰、疾病、气候与环境。这套书既弥补了中国历史学家在全球史写作中“缺席”的遗憾，也体现了一代中国学人的视野和抱负。

作为“启蒙读物”的《全球通史》

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，读的第一部全球史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L.S.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：从史前到21世纪》。本书初版于1971年，1999年推出中文版，恰逢千禧年临近，给当时的中文世界带来了一种类似“敲开新世纪大门”的全新体验。我至今记得2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阅读这本书时激发出的奇思妙想。原来，汉朝与匈奴之间超过百年的征战，曾经导致草原部落大迁徙，随着一波又一波“蛮族”从蒙古高原一路向西涌入欧洲，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。耳熟能详的历史，竟产生过这般神奇的“蝴蝶效应”，实在是震撼。

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写法也与众不同。他摒弃了中国人习惯的、源自苏联史学的一种类似“上古—中古—近现代”三分法，而是以1500年为界，将人类历史分为两大阶段，即1500年前各大文明圈相对孤立的世界和1500年后开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。如此大刀阔斧又清晰明确的划分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从学术、眼界到叙事方式，《全球通史》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门，成为了很多人的“全球史启蒙读物”，难怪它风靡一时。此后，这本书多次出修订版，而图书市场上与全球史相关的书籍也越来越多。宏观层面，有海洋的全球史、贸易的全球史、疾病的全球史；物质层面，有糖的全球史、棉花的全球史、茶叶的全球史……不过，像《全球通史》这样全局性的通史著作还是偏少，而随着斯塔夫里阿诺斯于2004年去世，这本书已经不可能更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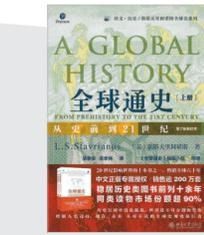
用肯尼迪家传记作者戴维斯的话讲：“这确实是死在船上之人唯一拥有的棺材。”对于“棺材船”的叙事经代代相传，已经固化为爱尔兰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。但是，麦克马洪对此提出质疑。他重估了移民船的死亡率，指出超过97%的爱尔兰移民抵达了目的地，死亡率远低于人们所旧知的20%。他认为“棺材船”的叙事淹没了爱尔兰移民的声音，忽视了他们的活力、创造力和能动性，力图还原亲历者的所思所为，以展现移民过程中的积极面向。麦克马洪不仅讨论了跨大西洋移民，而且将远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南半球区域的移民也纳入讨论，呈现了一幅完整的跨洋移民图景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麦克马洪将网络作为揭示爱尔兰人成功移民的关键。在20世纪兴起的数字网络理论应用广泛，既可表现为人际关系网络，也可表现为商贸关系网络。麦克马洪认为，爱尔兰人尤其擅长利用社会网络克服重重阻碍，实现移民目标。跨洋移民价格不菲，而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底层，他们何以支付这笔费用？麦克马洪通过爬梳史料指出，移民们不仅通过变卖家当筹款，而且充分调动自身所在的地方性与跨国性网络，从而获取家乡与海外亲友的资助。各类信息也通过网络传递，使移民及时获取有关船票、旅程时间以及食物与衣物配备等方面的实用资讯。而抵达移民地点则意味着新的生存挑战，此时社会网络同样为移民成功定居提供缓冲。除了海外亲友的直接接济，爱尔兰地主借助其他移民居海外时，也利用跨国关系网络确保移民者的基本生计。爱尔兰的“大人物”为穷困移民提供关系网托垫，使其在新社会实现“软着陆”。麦克马洪注意到，移民在海上建立的临时关系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。“棺材船”在航行中切断了移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，爱尔兰地主借此其他移民居海外时，也利用跨国关系网络确保移民者的基本生计。爱尔兰的“大人物”为穷困移民提供关系网托垫，使其在新社会实现“软着陆”。麦克马洪注意到，移民在海上建立的临时关系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。“棺材船”在航行中切断了移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，爱尔兰地主借此其他移民居海外时，也利用跨国关系网络确保移民者的基本生计。

《棺材船》旨在挑战大饥荒期间爱尔兰移民的经典叙事。在这一叙事传统中，爱尔兰的跨洋移民饱经恐慌、疾病与死亡困扰。作为死亡意象的“棺材船”被用于指代大饥荒期间的移民船，



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 葛兆光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《全球通史：从史前到21世纪》 [美] L.S.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《新全球史：文明的传承与交流》 [美]杰里·本特利 [美]赫伯特·齐格勒 著 魏凤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

了。算起来，最新一版的《全球通史》距今也有20多年了，期间，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日新月异，映照之下，这部书有些落伍了。

通史偏少是有客观原因的。首先，通史写作本就体量庞大，涉及面又十分广泛，更何况还是全球史，这对作者的脑力和体力都构成了巨大挑战。在学科划分精细、专业壁垒森严的当下，单个历史学家想掌握如此庞杂的知识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一位历史学家如果立志写全球史，势必借助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。为此，他需要具备黄仁宇所说的“大历史观”，能把千差万别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，纳入整体性叙事，以免“拼盘”之感。这绝非易事，因为它不仅考验作者的知识面、知识量，更考验作者的历史观、价值观。《全球通史》就蕴含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观——他之所以将1500年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标志，正是因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帷幕徐徐拉开，世界各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，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全球化格局逐渐形成。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，是斯诺夫里阿诺斯看重的。

“从中国出发”的全球史

国内一般把全球史称作世界史。追

根溯源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始于晚清，由林则徐《四洲志》、徐继畲《瀛寰志略》、魏源《海国图志》发其端，至20世纪中叶周一良、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《世界通史》问世后成型。20世纪90年代，吴于廑又与齐世荣主编六卷本《世界通史》，作为高校教材之用。如今，不少高校设有世界史专业，属于一级学科。

传统的世界史研究偏重于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宏观层面，而且往往以国家、民族为叙述主体，成为葛兆光教授所说的“国别史的拼合”，如英国史、法国史、美国史、日本史等。国别史自有其意义，不过，民族国家毕竟是晚近的产物，用今天的滤镜映照过往的人事，难免变形失真。传统的史学研究还有“以己度人”的毛病。举例而言，中国人信奉“大一统”，认为统一代表治世，分裂意味着乱世。放在中国的语境里固然没问题，但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两河流域兴起过赫梯、亚述、巴比伦等古王国，它们都未曾完全征服该地区，难道能说两河流域一直处于乱世吗？其实，古代很多帝国的政治制度、文化观念与“大一统”差异甚大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就指出，在波斯帝国，地方总督拥有很大自治权，这同实施郡县制、皇帝能牢牢控制地方的秦汉帝国很不一样。

当然，以己度人实为通病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美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就批评过所谓“欧洲中心论”。巴勒克拉夫指出，西方史学界总是习惯于把欧洲（主要是西欧）作为世界历史的主轴和动力，有意无意地贬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明成就，认为它们都是需要欧洲人拯救的“野蛮”地区。

为打破欧洲中心论，巴勒克拉夫倡导“全球史观”。他主张历史学家建立“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”，把世界上的每个民族、每个文明放在平等位置上，进行公正的叙述。巴勒克拉夫开全球史之先河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》就是对其主张的实践。近年来引进的《新全球史：文明的传承与交流》《企鹅全球史》，亦可作如是观。

放置于这条脉络中，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。一方面，这套书由葛兆光、梁文道策划，20多位中国学人共同撰稿，“全华班”阵容打造，自然能够免疫于欧洲中心论。另一方面，撰稿人也在尽量避免滑向“中国中心论”。诚如葛兆光所言，全球史瓦解“中心”，强调“联系”，不管以哪个区域为中心，都违背了这一理念。

不搞“中国中心论”，但要“从中国出发”。区别在于，前者把自己当作单一主体，后者则承认存在多个主体，只是我在

自己的主体位置上观照全球。这是因为有人总是从特定角度看待和认识世界的，没有人（哪怕汇聚优秀学人）可以全知全能，做到完全客观。只要尊重各自的主体性，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上展开论说，就不会重蹈以己度人的窠臼。我想，葛兆光教授说全球史写作应该“超越帝国、国家和族群”，便蕴含着这个道理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撰稿人通常从与中国相关的事物讲起，层层扩展，编织成繁复浩荡的多声部交响乐。在这部交响乐中，中国不一定始终是主角，但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的息息相关。例如，尽管在船队规模、资源投入、航海技术等多项指标上，郑和下西洋“秒杀”哥伦布、麦哲伦等人的探险行动，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却是后者。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。不过，明清时期，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，奠定了“白银时代”；美洲的玉米、土豆、辣椒也在中国广为栽种，养活了大量人口。可见，中国从未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。

联系与交流是全球史的主旋律

无论是在书里，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葛兆光都反复强调：“全球早就彼此联系。”这番用心，放在当前的语境中颇耐人寻味。

40多年来，全球化可谓高频词，尤其是随着“中国制造”遍布世界，互联网又无远弗届地延伸，人们一度乐观地以为“地球是个村”“世界是平的”。可事情总有两面性——有全球化，就有逆全球化。近年来，欧美国家民粹主义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建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墙。也有人试图将特定区域说成人类文明的唯一发源地，其他古文明则一概被贬斥为“伪史”。

在我看来，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正是形形色色逆全球化思潮最好的解毒剂。它致力于寻找和重构历史中有机的、互动的关系，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。

综观人类历史，联系和交流是一以贯之的主旋律。两河流域（又称“新月沃土”）的人们发明了小麦种植技术、青铜铸造技艺、楔形文字；古埃及人创造了太阳历、莎

草纸、十进制计数法；中国古人贡献了丝绸、纸张、火药；波斯人、阿拉伯人则极大地推进了造船和航海技术。凡此种种，共同构成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。精神领域则有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，中国虽自成一体，形成辐射亚洲东部的儒家文化圈，但也深受佛教影响。

古代的全球化到什么程度呢？罗马贵族穿着中国的华美丝绸，享用东南亚的香料；汉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里，种植着西域的奇珍异草。在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一书中，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如数家珍地介绍唐代舶来品，从飞禽走兽到动物植物，琳琅满目，活色生香，而且这些物质已然渗入日常文本。白居易诗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，其中的“瑟瑟”，原指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，呈天青色，用来形容碧波十分贴切。

可以想见，如果没有长期交流带来的互通有无、相激相荡，而是每个地区各自为政、孤立发展，今天人类恐怕还生活在原始状态。美洲就是例子。大约一万年前，因海平面上升，淹没了连接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白令陆桥，美洲与亚隔绝。美洲没有铁器和大型牲畜，农业、手工业落后，因而尽管美洲人创造了像玛雅、阿兹特克、印加等古文明，但生产力水平一直很低。

15世纪末，欧洲航海家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，将美洲纳入全球化进程。欧洲人给美洲带去马、牛、羊等家畜，以及小麦、甘蔗等农作物，美洲的玉米、烟草、咖啡等输入欧洲，进而传遍全世界。这叫“哥伦布大交换”。大交换过程中固然充斥着暴力和掠夺，对此，全球史不回避，但研究者同时会强调，它在客观上塑造了现代世界。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史研究者普遍把1500年设为标志性节点。

当然，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不可能尽善尽美。葛兆光教授坦言，把如此庞杂的内容整合起来要克服诸多障碍，此前的架构设计和内容撰写均属“权宜之计”。此外，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，由于撰稿人较多，虽然经过打磨，仍难免出现文风、节奏不一致的情况。不过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，广阔的未来正待中国学人们继续开拓。

好书过眼

跨洋移民中的爱尔兰社会网络

陈剑



《棺材船：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》 [爱尔兰]奇安·T.麦克马洪 著 初爱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用肯尼迪家传记作者戴维斯的话讲：“这确实是死在船上之人唯一拥有的棺材。”对于“棺材船”的叙事经代代相传，已经固化为爱尔兰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。但是，麦克马洪对此提出质疑。他重估了移民船的死亡率，指出超过97%的爱尔兰移民抵达了目的地，死亡率远低于人们所旧知的20%。他认为“棺材船”的叙事淹没了爱尔兰移民的声音，忽视了他们的活力、创造力和能动性，力图还原亲历者的所思所为，以展现移民过程中的积极面向。麦克马洪不仅讨论了跨大西洋移民，而且将远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南半球区域的移民也纳入讨论，呈现了一幅完整的跨洋移民图景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麦克马洪将网络作为揭示爱尔兰人成功移民的关键。在20世纪兴起的数字网络理论应用广泛，既可表现为人际关系网络，也可表现为商贸关系网络。麦克马洪认为，爱尔兰人尤其擅长利用社会网络克服重重阻碍，实现移民目标。跨洋移民价格不菲，而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底层，他们何以支付这笔费用？麦克马洪通过爬梳史料指出，移民们不仅通过变卖家当筹款，而且充分调动自身所在的地方性与跨国性网络，从而获取家乡与海外亲友的资助。各类信息也通过网络传递，使移民及时获取有关船票、旅程时间以及食物与衣物配备等方面的实用资讯。而抵达移民地点则意味着新的生存挑战，此时社会网络同样为移民成功定居提供缓冲。除了海外亲友的直接接济，爱尔兰地主借助其他移民居海外时，也利用跨国关系网络确保移民者的基本生计。爱尔兰的“大人物”为穷困移民提供关系网托垫，使其在新社会实现“软着陆”。麦克马洪注意到，移民在海上建立的临时关系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。“棺材船”在航行中切断了移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，爱尔兰地主借此其他移民居海外时，也利用跨国关系网络确保移民者的基本生计。

《棺材船》旨在挑战大饥荒期间爱尔兰移民的经典叙事。在这一叙事传统中，爱尔兰的跨洋移民饱经恐慌、疾病与死亡困扰。作为死亡意象的“棺材船”被用于指代大饥荒期间的移民船，

性贸易循环体系。麦克马洪指出：“19世纪海洋资本主义的循环系统，不仅长途运输木材、生铁、精美陶器，而且也包括移民。”大饥荒时期，这张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网能够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移民的运输线，服务于爱尔兰移民的需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19世纪中叶正值英帝国如日中天之际，其殖民触角远及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。爱尔兰人作为英帝国的成员，他们随帝国扩张在全球各地的扎根已久，这为饥荒时期的移民获取关系支持并得到远方的资金创造了条件。工业化则提供了新的交通工具。例如，一些爱尔兰移民前往港口的过程中，享受了火车提供的速度与便利；而在跨越爱尔兰海的航行中，蒸汽船充当了流动的纽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棺材船》一书也为海洋史研究作出了贡献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，海洋社会史作为海洋史的分支领域迅速发展，但是海洋移民问题未受重视，此书旨在弥补这一不足。麦克马洪还力图扭转移民史研究中的“陆地中心主义”，使移民史研究中被通常作为“真空地带”的海洋世界得到复原。他利用爱尔兰移民的第一手记述重现了海上生活中的生与死，塑造了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。

同时，《棺材船》回应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洋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场争论。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迥异的观点：通过研究商业航运史，雷迪克发现海员不仅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，还要同作为资本主义化身的船长展开博弈，从而否定海员生活的浪漫主义叙事；而作为海军社会史研究权威，尼古拉斯·罗杰反对将海员生活视为炼狱的观点，他在《木质世界：乔治王时代海军之解剖》中发现海军海员生活得到了良好保障，以此解释英国海军何以成为常胜之军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麦克马洪选择了罗杰而非雷迪克开辟的叙事路径，成为这场经典争论的延续。除此之外，麦克马洪拆除了“棺材船”传统叙事中已经固化的大西洋框架，将大西洋以外海域中的移民经历纳入书写，突破了塞巴斯蒂安·康拉德所谓的“容器式思维”：“历史学家原本选取了新的地理单位，但最后却往往将这些新单位变成了特定单位。”以海洋史为例……海洋未能用作具有启发意义的空间，反倒迅速凝成固定的区域取代体。历史学家不过是用一种空间取代了另一种空间（即民族国家）。”对于特定海域框架的突破也成为《棺材船》的一大亮点，海洋史的流动性、连通性与全球性由此得到充分的展现。

觥筹交错掩映下的礼仪秩序

读《酒里乾坤：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》

陈斌

关于宋代宴饮，《酒里乾坤：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》一书呈现了这样一幅具有想象力的恢宏场景：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朝廷制定了一份集英殿宴的人宴人数表，统计数据显示，能够参与宴会的人员达到1300余人，而且这是经过详细“裁定”的结果。1300余人并不全部都是赴宴的文武百官。其中，筹备宴会的御厨人员600人，负责装饰和布置宴会的仪鸾司150人，清洁卫生的洒扫亲从官100人，以上相关服务人员就达到了850人，正式参加宴会的文武百官仅仅占据了三分之一而已。

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繁盛阶段。宴会是一种群体性的饮食活动，宴会过程中所展示的食品、器物、酒饮、乐舞、游戏、礼仪、习俗等，集中呈现了社会阶段性物质发展水平与文化风貌，是观察社会发展状况的显微镜。《酒里乾坤：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》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视角考察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宴会活动，情景式再现了宋人的饮食生活日常。

关于宋代宴饮，无论是宋徽宗赵佶亲自操刀的《文会图》，还是北宋宣和画院侍诏苏汉臣的《开泰图》，抑或南宋画家马远的《华灯侍宴图》等画作，均有接近真实反映当时宴饮热闹场景的生动“写生”。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更是将北宋市井宴饮文化延伸至市井街头，画中酒肆林立，食客熙熙攘攘。在1999年5月发现的河南开封州宋砖雕壁画墓中，墓壁上有一幅夫妇宴饮图，真实再现了宫廷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状态。如此说来，宋代宴饮文化之兴盛，早已成为社会上下的普遍共识。

宋代宴饮文化的发展，首先离不开宫廷的强力推动。宋代以大宴大会为名的大型宴会活动包括“春秋大宴、春节大宴、郊祀、藉田礼而举行的饮福大宴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型宴会”。据《宋史·礼志》记载，“凡国有大庆皆大宴”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具有皇帝私人性质的曲宴、修书宴、曝书宴、观书宴等，总之名目繁多。一般情况下，国家大宴时间相对固定，但遇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、战争、丧葬，“甚至是国家科举考试中的殿试等情况”，则需要罢宴。宋代对宴饮的重视还表现在，凡国家大宴朝臣无故不得请假，“每逢遇宴会，臣子称病不赴者，朝廷派遣中使，医官看验真假，一旦发现虚伪造假，严格按照朝廷规定施行惩戒”。那些有幸参与宴会的人并不意味着可以开怀大饮，“如果出现了诸如醉酒失态、拉扯闲谈、大声喧哗、逾越座次等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举止，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”。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宫廷，庄重的礼仪秩序永远不能丢。

众所周知，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留下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历史典故。在这场特殊的宴会活动中，宋太祖以一种“艺术”的方式，轻松化解了他对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群体的焦虑，构建了全新

的君臣秩序。而在本书作者看来，宋代对宴饮确立的特殊地位，“是五代以来朝堂礼崩乐坏之后，北宋政权在建立之际，为了树立起重建大一统国家礼制的确决心而做出的政治姿态；另外，考虑到宴饮活动本身的特殊性，凸显宋代国家‘宴以恩惠’的基本理念”。宴饮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朝廷的凝聚力，另一方面则是宣示皇恩浩荡，借此拉拢人心。实际上，类似大操大办的宴饮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宫廷，在地方各级机构中亦合法存在，“国家甚至专项拨款予以支持”。

宋代宫廷宴饮的秩序不仅表现在官阶大小座次之别、饮酒顺序异同，还表现在器具的差别。“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朝廷就明确规定，凡是器用，禁止表里涂抹朱漆、金漆，不允许以红色为底衬。非三品以上官员、宗室、皇帝国戚，禁止使用金器。使用银器，则禁止涂抹成鎏金色。玳瑁酒食器具，非皇宫大内一律禁止使用。纯金器具，只有被皇帝赏赐者方可使用。”这一点，与欧洲皇室都喜欢用银制作餐具和摆件异曲同工，越是贵重，越能折射身份的尊严。

有所好，下必效之。民间风气无疑是官方宴饮文化的延伸。在远离宫廷的普通社会，同样存在许多宴饮，有的与今天大体相同，如婚丧嫁娶，重大节日等。最具雅致特点的可能是文人的宴饮。众所周知，宋代诗词文化是中华历史上的又一高峰，涌现出大批以诗词闻名后世的文人。宋代文人写诗作赋，有时源自宴饮场合的诗词游戏，有时则来自于宴饮与山水结合后的澎湃激情流露，如苏轼的《赤壁赋》里就有“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”。

宋代宴饮文化还充分表现在对外来使者的差别化接待。“契丹使者安置在都亭驿，西夏使者都在都亭西驿，而高丽使者安排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，另有回鹘、于阗等使者则安顿在礼宾院，其余诸番使者一般安顿在瞻云馆和怀远驿”。契丹来使的“接待规格和礼仪等级居于各方来使之首位”。



《酒里乾坤：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》 纪昌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

宋代宴饮文化还充分表现在对外来使者的差别化接待。“契丹使者安置在都亭驿，西夏使者都在都亭西驿，而高丽使者安排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，另有回鹘、于阗等使者则安顿在礼宾院，其余诸番使者一般安顿在瞻云馆和怀远驿”。契丹来使的“接待规格和礼仪等级居于各方来使之首位”。

宴饮礼仪风气的兴盛，刺激宴饮文化的飞速发展。南宋国力虽不及北宋，但在宴饮方面一点都不含糊。“南宋时期，临安城里专门负责提供公私各类宴会服务的商业组织——四司六局”，分工日益精细繁杂。同时，人们对食材的要求开始从味觉转向视觉，“对食材进行雕刻装饰”“日成风气，有的雕刻仅仅‘为席而上的看餐’，极尽奢侈”。此外，宴饮文化同时大大刺激了“用于娱乐消遣的杂剧表演”。目睹南宋朝歌歌舞升平的宋代诗人林升，曾在诗中发出灵魂叩问：“外市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”

随着近年宋史研究走热，宋代经济的繁荣程度令人惊叹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欧洲这时正经历中世纪最为黑暗时期。宋朝国力的繁荣与强大不应否认，但也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。文头所叙宋神宗熙宁二年举办大宴的这年，王安石坐马上任参加知事，次年便推出均输法、青苗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。王安石变法的核心，是通过改革实现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，实际是解决日益枯竭的财政危机。作者对宋代大规模宴饮活动有个初步的统计数据：“南北两宋，一共有18位皇帝，举行祭天大礼共105次，包括南郊大帝57次，其中北宋38次；明堂大礼48次，其中北宋17次，南宋31次。”宋代宴饮文化的毫无节制，必然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。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，在众多原因中，肯定少不了一些人对于宴饮陈规陋习的顽固坚守。